

近年来，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步伐日益加快，在国家、民间、个人、海外各方力量的推动下，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速度不断加快、幅度不断拓宽、程度不断深入，取得了巨大成绩。相形之下，对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研究还比较滞后，存在着对传播效果评估不足、传播规律把握不深，对传播实践的指导性薄弱等问题，需要从基础研究和文化实践两方面着手改善。

在基础研究中，应从注重“传播”转向注重“接受”。基础研究不一定直接有效，但可以指明文化实践最终应该实现的远景方向和目标。中国文学“走出去”以后，究竟取得了什么样的接受效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如何判断中国当代文学海外接受效果？笔者认为有8条核心参考标准：是否有翻译传播；是否有多种语言翻译传播；是否有一定重译率；是否有一定研究数量；是否有权威研究；是否是文学角度的研究；翻译和研究是否有持续性（历史）；研究或者接受意见是否具有广泛性（国际化）。当一个作家作品同时具备了以上8个条件时，意味着形成了无法否认的客观国际影响力。

在以上总体格局中，每个作家会形成各自的传播特点，甚至同一部作品在不同国家也会有较大的传播差异。这些传播差异既与海外合作方有关系，也和作品本身的艺术特点有关系；既有作家本人主观意愿，也有很多偶然性因素。对此我们都需要做更深入的研究。

从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接受效果来看，存在一些基本的规律性表现。比如：地理格局整体上渐渐形成欧美和亚洲文化圈两个传播中心的地理特征，这一转变意味着当代文学正悄然从边缘处生长出一种缓慢、温和但更容易让世界认同和接受的传播力量；译介状态从本土到海外，从政治到艺术，从单语到多语同步；海外图书的出版形式变得更加自由开放，“从中国出发”的海外传播与“从世界出发”的海外传播重合度越来越高。

在文化实践上，需要从融合与协同的角度直接着手相关的基础工程。比如筹建“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数据库”，组建一支多语种、专业化、国际化的合作队伍，积累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基础文献数据和各类相关资源，就此积极推进与国内外重要研究团队、高校、部门的合作，努力促成人才、资金、资源形成集中优势，产生合力效应。这种建立在扎实专业基础研究之上的实践性文化工程，一旦完成，将会产生强有力的蝴蝶效应，连通并拉动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方方面面，更好服务于整个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

从事文化事业，最需要的是耐心，底座足够宽大，储备足够深厚，才有可能最终看到“一览众山小”的风景。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走向世界的郭沫若

康莉蓉

“鲁郭并称”，从日本开始的海外传播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是继鲁迅后中国文化战线上的又一面光辉旗帜。他新文学创作的起点在日本，又在日本度过了文学和学术生涯中极其重要的光阴，“集散”在日本的世界文学，滋养、推动了郭沫若思想和创作的发展。所以，郭沫若的作品很早就引起了日本出版界的注意。1922年，日本东亚公司出版了大西斋、共田浩编译的《文学革命和白话新诗》，其中就收录了郭沫若的诗论和诗作，此时，郭沫若在中国诗坛上也才刚刚崭露头角。上世纪20年代中后期，日本的《满蒙》杂志刊载过关于郭沫若思想和创作的评述：“假如要指出现代中国新文坛的优秀作家的话，当然会推鲁迅和郭沫若二人，这是谁都不会有异议的。”鲁郭并称，这在批评界还是第一次。

日本是国外最早开展郭沫若研究的国家，从上世纪20年代到上世纪80年代，郭沫若的诗歌、小说、戏剧、历史研究、古文字研究等在日本被持续介绍、评论，在日本学者的中国文学史论著中，郭沫若一直都是十分重要的章节。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日有关郭沫若研究的交流日益加强，相互激励之势渐成。2003年，日本郭沫若研究会在东京国文学大学文学部成立，九州大学汉学家岩佐昌隆教授任会长，国文学大学藤田梨那教授任理事，九州大学武继平博士任秘书长。学会举办郭沫若论坛，出版《郭沫若研究会报》，成为日本学界持续开展郭沫若研究的有力的组织者。

历史剧《屈原》公演，在苏联受青睐

上世纪80年代以前，苏联是另一个对郭沫若文学成就关注甚多的国家。上世纪40年代，在重庆的苏联外交官、同时也是屈原研究者的费德林就和郭沫若过从甚密。1953年，费德林主编的《郭沫若选集》由莫斯科国家文艺出版社出版。在《前言》中，费德林评述了郭沫若的生平、思想、创作活动和学术成就。同一时期，郭沫若的诗集和史学著作在苏联被译介，其历史剧代表作《屈原》也在莫斯科叶尔米洛娃话剧院上演。1958年，苏联汉学家马尔科娃的著作《民族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诗歌》由莫斯科东方文学出版社出版，其中对郭沫若的抗战诗歌进行了详细介绍。1961年，马尔科娃又在另一部著作《论郭沫若的诗歌创作》中更为系统地论述了郭沫若的诗歌创作。

和日本学界一样，中苏（俄）两国学者在郭沫若研究上保持交流。1992年，80岁高龄的费德林亲赴北京参加纪念郭沫若100周年诞辰国际学术讨论会；2012年6月，纪念郭沫若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圣彼得堡大学召开，来自中俄两国的学者共同研讨郭沫若的文学成就。

多语种代表作问世，欧洲各国广泛关注

在英语世界，对郭沫若作品的介绍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开始了。1936年，英国学者哈罗德·阿克顿与中国学者陈世骧编

译的《中国现代诗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选编的《活的中国——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都有相关作品的收录。不过，由于长期受冷战思维的影响，郭沫若的文学价值后来并没有在英语世界得到足够的肯定，即便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这样的名著，也不曾正视郭沫若在文学与史学方面的重要贡献。

即便如此，郭沫若创作本身所蕴含的世界文化因素依然在不同时期引起世界许多国家的关注和兴趣。法国巴黎分别在1970年出版了郭沫若的自传《童年时代》、1982年出版了历史剧《棠棣之花》，后者由龚古尔文学院院士埃·罗布莱斯作序；德国于1984年翻译出版了郭沫若的自传《少年时代》；意大利在上世纪50至70年代持续翻译了《女神》《星空》《屈原》《孔雀胆》等郭沫若作品；东欧国家也在上世纪50年代翻译介绍了郭沫若的诸多作品，包括罗马尼亚1955年翻译出版的《郭沫若选集》、匈牙利1958年翻译出版的历史剧《屈原》、波兰翻译出版的《屈原》《郭沫若选集》《百花齐放》等。郭沫若的文学成就也受到了东欧汉学界的重点关注。1980年，捷克著名汉学家马利安·高利克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产生（1917-1930）》，用专章讨论了郭沫若文学思想的发展问题。

世界推广走向深入，共筑世界级研究平台

作为现代中国文学的重要财富，郭沫若也是当代中国出版界和学术界向世界人民推荐的文化瑰宝。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外文出版社就陆续推出郭沫若著作的英译本，包括1953年由杨宪益和他的夫人戴乃迭英译的历史剧《屈原》、1958年英译《女神》诗选等。

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与文化影响力日益增长，郭沫若也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内容，出现了两个现象，一是作为国际文化交流事业的郭沫若纪念与世界巡展蓬勃开展，二是中外学者在更加紧密的学术交流中共筑郭沫若研究的世界平台。

郭沫若纪念馆是国家级的郭沫若文献收藏、展示和研究中心，作为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的依托单位，它同样是中國郭沫若研究会的联络中心、信息中心和学术交流中心。2013年开始，该馆坚持“走向世界”的文化方略，通过海外展览、文化宣传、学术宣讲与对话等方式分别在美国、巴基斯坦、土耳其、新西兰、肯尼亚、意大利、埃及、哈萨克斯坦、加拿大、罗马尼亚、澳大利亚等国开展文化交流，为中国现代文学海外传播树立了成功典范。2016年8月，郭沫若纪念馆、北京语言大学中东学院、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三方决定在苏伊士运河大学建立“郭沫若中国研究中心”，这是“一带一路”倡议下首个以中国名人命名的海外研究中心。

在中外学者的积极响应和热情支持下，郭沫若先生的外孙女、日本国士馆大学藤田梨那教授发起成立了国际郭沫若研究会（IGMA）。2009年8月，第一次国际郭沫若学术研讨会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华盛顿特区学区召开，学会又先后在中国、俄罗斯、奥地利、日本、法国等国家召开主题性的研讨会，为郭沫若研究注入了新活力。
(作者系四川大学图书馆副编审)

生命与创造的文明论

——读赵本夫长篇小说《荒漠里有一条鱼》

刘大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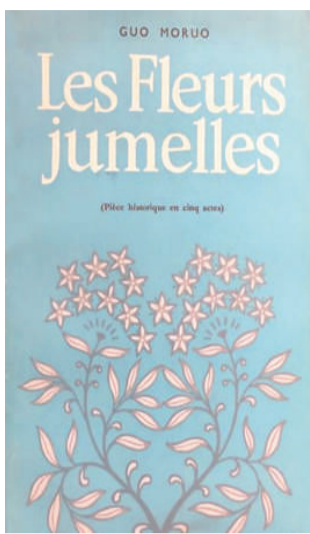
在当下小说创作的整体潮流中，赵本夫《荒漠里有一条鱼》无论从语体风格还是主题旨来说，都是一个异类。这是一种带有宏大叙事色彩的寓言式写作，它以大开大合、混沌刚猛的结构与语言，从19世纪中叶写到20世纪中叶，黄河故道荒原上自力更生的人们，植树造林抵御风沙，历经水灾、饥馑、风沙、烽燧、殖民入侵，始终没有丧失原初的生命活力，生生不息，连绵不绝。

小说以带有民俗文化意味的开头起始，但并不铺陈风情细节，而是用泼墨写意式的精省笔墨，展示了黄河岸边洪涝生态中的渔民生活及其精神状态。洪水在这种生态中具备了神话原型意味：洪水到来，让原本繁衍生息的村庄变成一片荒漠，但洪水中也孕育出一尾巨鲤，它被称为鱼王。洪水无情，以万物为刍狗，但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鱼王却始终跃于洪波之上中撒子传承，如同河岸的民众。咸丰年间的大洪水涤荡一切，生命复归于荒芜，这次洪水即是1855年铜瓦厢黄河大改道，由淮河水黄海转向由大清河入渤海，到20世纪30年代末，80年间造就了一片新的沃野滩涂。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沧海桑田，小说的主体就是在这个时空中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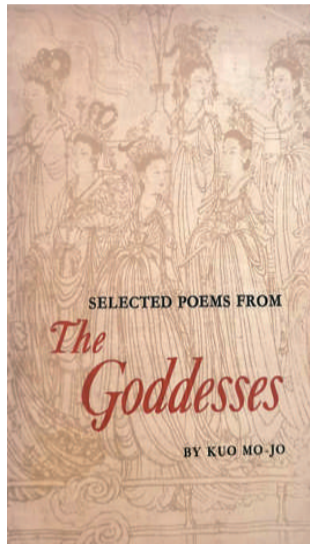
赵本夫显然有意构建一个荒原创业的神话叙事：洪水过后一切从头开始。小说采取了双线叙事，一条是从晚清水灾后荒原上的人类子遗怎样在外来文明的刺激下开始植树造林、艰难生存，形成后来鱼王村的雏形；另一条是鱼王村人在抗战期间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不间断地乞讨、种树、护林、屡遭破坏而又从不放弃的故事。两条线索交织并行，但其实一脉相承，构成了一个文明诞生、冲突与发展的寓言，探讨的是事关蒙昧、野蛮与文明的总体性命题。显然，小说将叙事的着力点，或者说文明滋生与延续的动力因子归结到原始生命力之上。

《永不熄灭的火焰：吉狄马加诗歌评传》出版

本报电（邹金涛）近日，波兰诗歌新生代诗人大流士·托马斯·莱比奥达著、张振辉译的《永不熄灭的火焰：吉狄马加诗歌评传》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作者以阐释吉狄马加的具体诗歌文本为切口，呈现出其诗歌创作背后的精神探索之路。他将吉狄马加的诗歌置于文化学和人类学的广阔背景中，通过剖析“自我意识”和“动物”“色彩”等意象，探秘诗人的宇宙观和世界观，其评述兼具学者论之有据的严谨品格与诗人敏感的哲性思考。吉狄马加曾有5部诗集被翻译成波兰文出版，《永不熄灭的火焰：吉狄马加诗歌评传》一书是在中国出版的第一部外国学者研究中国当代作家诗歌的作品。



法文版《棠棣之花》
外文出版社1982年版



英文版《女神》
外文出版社1978年版



英文版《郭沫若选集·历史剧五种》
外文出版社1984年版

案头这套由张培忠担任总撰稿的报告文学《奋斗与辉煌——广东小康叙事》，由《百端待举》《风生水起》《攻坚克难》《逐梦飞扬》四部组成，是对广东40多年历史巨变的真实叙事，更是在回望过去与现场观察的基础上形成的广东小康“创业史”。

这套丛书从上世纪70年代末，发生在当时的广东宝安县布吉公社的“逃港”事件开始叙述，这种回望式的写法，务实并巧妙地迅速打开了历史的窗口。人们为什么不留在世代居住的家乡？贫穷恐怕是问题的根源。当年，在窄小的深圳河边，大陆与香港两岸的强烈对比，让敢闯敢干的广东人产生了到对岸谋出路的想法。笔锋一转，改变发生了。1978年，中央和广东的有关领导深刻意识到人们“逃港”的真正原因，及时调整政策，因势利导，借助广东濒临港澳、华侨众多的区域特点和优势，创新建立特区，从而开始了广东乃至中国的伟大改革开放进程，为广东的新生长和发展，开启了大门。

《奋斗与辉煌——广东小康叙事》，对这个大门开启之初进行了真实的记述：以东莞张子弥为代表，开展的“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的“三来一补”企业生产运营方式；清远稻田管理“五定一奖”（定劳力、定地段、定产量、定工分、定成本，超产奖励）的先进经验；南海县的“六个轮子一起转”（县、公社、大队、生产队、个体、联合体）公私体制联合行动的创新；高要县围绕陈志雄个体企业雇工人数“七上八下”界限的讨论等，一直到深圳建立特区，袁庚创办蛇口工业区、宝安县南岭村张伟基大胆引进外资等创举，这些奋斗足迹使深圳、广东的社会面貌和经济活动迅速发生了巨大改变，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刻影响了今天的中国与世界。

因为是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所以广东时常有出人意料的主张与行动，像蛇口提出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益就是生命”的口号；像深圳国贸饭店建设的深圳速度；像广州白天鹅宾馆打开大门，让人们感受“世界领先水准的服务和更高质量的生活”的情景等。广东、深圳、珠海等地，创造了很多中国第一，甚至是世界第一。书中不仅表现了广东在改革开放中的实践经验和成绩，更彰显了广东“敢为人先、务实进取、开放兼容、敬业奉献”的宝贵精神。

历史以沉淀结果的方式凝固存在于未来的岁月中，供人们回望和认识。这套《奋斗与辉煌——广东小康叙事》，正是在对广东此前40多年发展变革道路的回望中形成的，它具有在宏观背景下用微观方式展现的特点，又有水珠映照阳光般的奇特效果。它既是广东小康之路的一部恢宏史志，也是用文学情怀和笔墨表现历史的优秀作品。

(作者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

——评报告文学《奋斗与辉煌——广东小康叙事》

李炳银

战士指看南粤
更加郁郁葱葱

